

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

王安石散文選集

◆ 王水照 高克勤 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

王安石散文選集

◆ 王水照 高克勤 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聯合出版

44.6242
WAS

責任編輯 倉陽卿

書 名 王安石散文選集

(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)

編 撰 王水照 高克勤

聯合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
發 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

開 本 787×1092 1/32 插頁2

字 數 258,000

版 次 1997年4月第1版

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張 11.25

印 數 1 - 5,000

書 號 ISBN 7-5325-2243-1/I·1138

定 價 14.80元

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

編纂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散文，興于春秋戰國，歷經漢魏，踵事增華，至唐宋嬗變創新，豪擁以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等八大家為傑出代表的作家羣，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峰。八家的散文理論和創作，皆具獨詣，各樹豐碑，使散文藝術臻于極致，在中國文學史上鐫刻了光耀千秋、惠澤萬代的煌煌巨章。

這套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叢書，係從我社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出版的《中國歷代散文作家選集》大型叢書中輯出。現將叢書編例說明如下：

一、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共七冊，內中蘇洵、蘇軾合為一冊，其他六家各為一冊。

二、諸家選集的人選篇目，力求體現該作家各時期的創作風貌。作品的編次，大抵以寫作時間先後為序，無法編年者置于最後。原文一般以近期出版較完善的點校本為據，槧本多而又無點校本者，擇善而從。各版本異文一般不注，關係到內容理解者則加以注明。

三、各集均有“前言”，介紹該作家生平、思想、創作歷程，着重分析其散文風格的形成與發展變化，提示其創作成就及在文學史上地位等。

四、古代的言文，向不一致。爲便于讀者理解和欣賞原作，對於入選的每篇作品，均作“題解”、“注釋”和語譯。

竭誠歡迎讀者對本叢書編纂工作批評指正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五月

前言

王安石（公元1021—1086年），字介甫，晚號半山，曾封荊國公，撫州臨川（今江西撫州）人，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。他從事政治、學術和文學創作的年代，主要在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。

作為一個政治家，王安石從青年時代踏上仕途開始，就把自己的一生同宋王朝的命運密切地聯繫在一起。當時，宋朝開國已近百年。自從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之後，宋朝潛在的國內外矛盾便開始暴露。國內，官僚隊伍臃腫腐敗，軍隊驕橫而缺乏戰鬥力，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，這一切加重了人民的苦難，導致階級矛盾日趨激化。同時，宋朝還面臨着遼和西夏兩個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。宋朝每年要向遼、夏輸納大量銀絹作為“歲幣”，以換得邊陲的暫時苟安之局。為了挽救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危機，王安石在執政後倡導了變法運動，並傾注全部精力於其中；他在政治上的進退，此後也隨變法運動的發展而變化。有意味的是，當新法被推翻時，王安石也走完了他的一生。這位政治改革家的生命，是與他倡導的新法一起結束的。因此，九個多世紀以來，人們一般把他作為一個政治家來看待，圍繞他的變法的評價而聚訟紛紜，爭論不休。確實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，幾乎沒有一個文學家如王安石那樣與政治的關係如此密切。

王安石本人也以政治家自命，而恥以文士立名。他從小

接受了傳統的儒家思想，立下了建功立業的大志。因此，王安石的文學思想也表現出政治家的色彩。其文學思想的核心，概括而言，就是經世致用，重道崇經。這一思想貫穿在他一生的文論之中。在早年所作的《上人書》等文中，他明確指出：“嘗謂文者，禮教治政云爾。”又說：“所謂文者，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。”王安石把文學的內容囿於“禮教治政”的範圍，或稱之為“治教政令”（《與祖擇之書》）。這裏顯然繼承了儒家傳統的“詩言志”說而又有所發展。他晚年著《字說》，解釋“詩”字曰：“詩者寺言也，寺為九卿所居，非禮法之言不入，故曰思無邪。”仍然堅持這一文學觀點。王安石強調“文章合用世”（《送董傳》），“要之以適用為本”（《上人書》），而不拋棄形式，主張“文貴自得”（同前），以盡言其志。王安石經世致用的文學觀的基礎是重道崇經。他也主張“文貫乎道”（《上邵學士書》），自稱“安石不為通乎道者，曰有志乎道可也”（《與楊蟠推官書》）。其《周禮義序》明確指出：“惟道之在政事”。可見他指的“道”是治國安邦之道，也就是所謂“禮教治政”，這與唐代韓愈等人所說的“道”顯然有所區別，表現出王安石作為政治家的特色。重道必然崇經。王安石對儒家經典下過很大的功夫，認為“經術正所以經世務”（《宋史·王安石傳》）。因此，他對當時沿襲漢儒以來的經學注重章句注疏的學風深感不滿。其《答姚闢書》指出：“夫聖人之術，修其身，治天下國家，在於安危治亂，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。”作為一個政治家，王安石把這一思想付諸實踐。他在執政後不久，即上《乞改科條制劄子》，建議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，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”。在執政變法期間，王安石還主持修訂了《詩經》、

《尚書》和《周禮》這三部儒家經典，或發掘儒家經典中原有的革新思想，或用附會的方法賦予儒家經典原未有的革新內容，以對付反對派的攻擊，為改革尋找理論根據。帶有現實的實踐色彩，具有廣泛的現實內容，這是王安石文論的一個特色。

王安石的文學思想，必然會影響其詩文批評及其創作傾向。他的詩文創作實踐，雖然與他的文學主張之間也存在着不盡相符之處，但總的說來還是其文學思想的具體表現。通過對王安石生平事迹的全面考察，以及對其詩文繫年的考證，可以發現他的詩文創作的題材和數量，隨其政治活動的發展變化而呈現出相應的發展變化，因此，可以將王安石詩文的發展按照其政治活動的五個時期（即初入仕途、入京為官、居喪講學、執政變法和隱居鍾山）來考察。這樣，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出王安石詩文發展的軌迹。以下，就王安石在各個時期的散文創作的內容及其風格，作一簡略的闡述。

一、初入仕途時期

這一時期從慶曆元年（公元1041年）王安石入京應進士試起，到至和元年（公元1054年）他入京為官前迄。王安石步入仕途之際，正值“慶曆新政”實行之時。以范仲淹等為代表的革新派，為了緩和北宋王朝面臨的危機，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改革弊政，史稱“慶曆新政”。然而，由於遭到同一階級中保守派的反對，這次改革不到一年便告失敗。但是，改革思潮仍在繼續發展，對於改革的內容和方法等問題的認識也逐步深化，改革已成為社會上的普遍要求。王安石深受改革思潮的影響，並與范仲淹、歐陽修等改革派領袖交往。當時的王安石，勤於學習，敏於政事。在地方官任上，他力

圖有所作為。如他在鄞縣任上，“起堤堰，決陂塘，爲水陸之利；貸穀與民，立息以償，俾新陳相易，邑人便之”（《宋史》本傳）。十餘年的地方官生活，鍛煉了王安石的才幹，爲他贏得了聲譽，也爲他執政後推行新法積累了經驗。

這一時期，是王安石詩文創作的發軔期。他這時的散文創作相當活躍，他的二十餘篇記敘文的大半都作於這一時期。這一時期所作的散文，內容豐富，題材廣泛，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，反映了王安石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和思考。揭露現實黑暗，抨擊弊政；關心國事，要求改革，是王安石這期散文的重要內容。長期的地方官生活，使王安石對下層人民的生活有了切身體會；慶曆革新促使他對宋代社會進行了廣泛的思考，並反映在他的散文之中。財政、吏治和教育科舉，是王安石尤爲注目的問題。王安石認爲，吏治的不善在於選才和用人的不當。他一再強調：“夫材之用，國之棟樑也，得之則安以榮，失之則亡以辱”（《材論》）；“取人之道，世之急務也”（《取材》）；“國以任賢使能而興，棄賢專己而衰”（《興賢》）。因此，他對當時的以講說章句文字爲主的教育制度深爲不滿。在地方官任上，王安石力求有所改革，把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，其文也記錄了他這方面的活動。如他在鄞縣時，興修水利，“屬民使浚渠川”（《鄞縣經遊記》）；上書轉運使，要求改革鹽政（《上運使孫司諫書》）；興辦縣學、推薦人才（《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》）等等。

王安石這一時期的散文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。這一時期所作多爲記敘文。傳統的記體文以敘述、描寫爲主，而王安石的記體文則偏於議論。他的文章敘事簡略，文字樸素，說理透闢，風格上與其詩相近，顯得峭直而又簡潔。《遊褒禪山記》是他這期所作的一篇著名的散文。文章以遊

記的形式，寄寓人生哲理，寫得脈絡分明，從記敘到議論的轉折十分自然，簡潔而富有哲理，充分表現出王安石散文長於議論的特色。同時，其文依經立論，博引史實的特點，也在這期散文中有所表現。作於慶曆七年（公元1047年）的《上相府書》，內容是作者請求安葬亡父一事。文章先引經據典，後方點出主旨，就是一個例證。

二、入京爲官時期

這一時期從至和二年（公元1055年）王安石入京爲羣牧判官起，至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因母喪離京丁憂前迄。其中除了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由羣牧判官出知常州、嘉祐三年（公元1058年）調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這一段時間外，王安石一直在京爲官。中央和地方的官宦生活，使他對當時社會的經濟、政治狀況有了更深入廣泛的了解；同時也使他十多年來關於改革的思考得到了更成熟清晰的表達。嘉祐三年冬，當他由江東提刑調爲三司度支判官，在離職赴京的日子裏，他系統地思考了多年來縈繞心中的種種問題，寫成了一篇洋洋洒洒、長達萬言的雄文，這就是次年入京所獻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。書中明確提出了“變更天下之弊法，以趨先王之意”的主張，表明他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改革思想。王安石的改革方案並未能爲宋仁宗所採納，但却引起了他的矚目。從此，王安石在北宋政壇上嶄露頭角。

這一時期，是王安石詩歌創作的豐收期，而散文創作則相對來說不夠活躍，但在風格上仍有所發展。這一時期的散文題材廣泛，在內容上仍然保持着前一時期那種密切聯繫現實，富於戰鬥性的特點。關心國事，要求改革，仍是這一時期散文的重要內容。在《議茶法》一文中，王安石歷陳榷茶

法的弊害，要求罷除。在他的建議下，江南東路的榷茶法在一個時期內得到了改變。集中體現這一特點的是他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、《上時政疏》等文章。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中，王安石全面、系統地提出了改革教育、科舉和官僚制度的方案，成為後來他推行新法的理論根據。王安石的這類文章，常能博引史實，借古喻今。他對歷史有着自己獨特的看法，而不盲從前代史書的結論，並由此闡明歷史教訓。鑒古在於知今。早在《答曾子固書》中，他就認為：

“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。”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中，王安石進一步指出：“法其意，則吾所謂改易更革，不至於傾駭天下之耳目，囂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。”其《興賢》篇列舉商、周、兩漢歷代興衰的史實，說明君主只有知人用賢，才能“跨兩漢軼三代，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”。《委任》篇引用蘇秦“不信天下，為燕尾生”的史實，說明“人主以狗彘畜人者，人亦狗彘其行；以國士待人者，人亦國士自奮”，要求君主善於使用人才、珍惜人才。王安石這一時期的散文雖然不多，但仍保持了前一時期文章說理周詳、議論風生的特點，而又有所發展。如《度支副使廳壁記》一文，指出理財須有善法，守法須有良吏，即“合天下之衆者財，理天下之財者法，守天下之法者吏也”。文章借題發揮，雖名為記，實是一篇論述財政問題的專論，筆力豪悍，氣勢逼人。而代表這一時期散文成就的，仍首推那篇被梁啟超譽為“秦漢以後第一大文”（《王安石評傳》）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。

三、居喪講學時期

這一時期，從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秋王安石在知制

誥任上因母喪離京回江寧丁憂起，至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秋他被召爲翰林學士入京前迄。在居喪期間，他潛心於著述，其《淮南雜說》和《洪範傳》等重要著作，可能都完成於這一時期。治平二年（公元1065年）服闋後，他因病未能赴京應召，遂在江寧設幄講學。通過講學，宣傳了他的改革思想，並在周圍聚集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，形成以他爲代表的新學學派，爲後來推行新法準備了輿論和人才。治平四年正月，年僅二十歲的青年皇帝神宗即位，他銳意進取，起用王安石執政，由此揭開了熙寧變法的帷幕。

王安石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都不甚活躍，散文創作主要是一些書信和幾篇學記。討論學術，宣傳改革，是這些文章的主要內容。由於講學，他在這一時期寫了不少和友人、學生討論學術觀點的書信。如《答韓求仁書》論《詩經》和《周易》，《答陳杞書》談《莊子》等，其中的觀點和他的《莊周》、《荀卿》等學術論文相一致，反映了王安石的學術思想。這一時期的散文如《虔州學記》、《太平州新學記》等文，不僅議論色彩更濃，善於引經據典、依經立論，而且風格上也由峭刻拗折漸趨平婉溫醇。

四、執政變法時期

這一時期從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秋王安石入京爲翰林學士起，至熙寧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他第二次辭相回江寧隱居前迄。這一時期，是王安石在北宋政壇上大顯身手的時期。熙寧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四月，入京不久的王安石向宋神宗上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》，揭露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，說明變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，王安石從經濟、政治、軍事和教育科舉制度幾方面，開始進

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熙寧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，他被任命爲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次年拜相。從此，王安石處於北宋王朝的權力中心，傾全部精力於變法運動之中。

王安石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也不甚活躍。詩文內容和變法運動密切相關，反映了變法運動的進程，表現了王安石在急劇變幻的政治風雲中的複雜感情。在變法過程中，充滿着激烈複雜的鬥爭，新法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圍攻。爲維護新法，王安石寫了一些論戰性的作品，如《答司馬諫議書》等，仍然保持了峭折剛勁的風格，詞鋒犀利，氣勢逼人。同時，其散文風格中平婉溫醇的一面，有了更明顯的發展。爲了給新法尋求理論根據，王安石這時期的文章更注重依經立論，如《上五事劄子》、《答曾公立書》等。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是他的《三經義序》。這三篇序言概括經義大旨，敘述撰寫緣起，依經立論，用詞簡潔，而且詞藻也多取之經典，被譽爲“辭氣芳潔，風味邈然”（方苞語，轉引自《古文辭類纂》）。

五、隱居鍾山時期

這一時期從王安石於熙寧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回到江寧起，至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逝世爲止。這一時期，他一直在鍾山過着隱居生活。脫離了繁重的政治活動，使得他得以專力於詩歌創作，數量也以這時期創作的最多；而他這時期的散文創作則日見稀少，主要是一些序文和書信。

由於新法的推行遭受挫折，以及愛子王雱的早夭，脫離政壇的王安石對世事開始產生了一種超然的態度，思想也發生了一些顯著變化。他這時常與友生、寺僧一起覽賞山水，誦詩談佛，尋求一種禪悅的境界。這一時期，他由早年的

“以佛濟儒”，即從佛教經典中吸取可以為儒家學說所利用的觀點，轉變為試圖向佛教尋求解脫。因此，他“願臨真覺之道場，親受雲門之法印”（《謝秀長老疏》）。由以儒為主、兼採佛老，轉變為佛教的信徒。他這時期創作了不少充滿佛教說教意味的詩文，表現了一種命定論的傾向，帶有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的色彩，反映了他這時期的思想變化。在與友人的信中，他暢談佛學，宣揚“一切如夢”（《與沈道源書》）的思想。然而，作為一個曾經執着於世事的政治家，畢竟未能全然遺世獨立。在隱居生活的初期，他還繼續修訂《三經新義》，撰寫《字說》，為新法提供理論根據。《字說序》是他這一時期所作的頗可注目的文章，在內容和風格上，都和《三經義序》相接近。

王安石的散文，在寫作上有着多方面的特色，在各篇的題解中已作了具體分析。以下，就其散文的寫作成就作一簡略的概括。

第一、題材廣泛，體裁多樣。王安石的散文，依體裁可分為談史論政的議論文，寫人敘事記遊的記敘文，以及書札、序跋、雜著和大量的哀祭文、墓誌銘。

王安石的議論文，按其內容又可區分為政論文、史論文和學術論文。如上所述，其政論文題材廣泛，觸及到宋代社會的各個方面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論辯色彩。其史論文縱論古今，善於將歷史和現實聯繫在一起，探討興亡治亂的原因，同樣具有現實的針對性。其學術論文則不囿於前人舊說，而自出己意。他的不少書信和雜記也都以議論行之。如《答曾公立書》解釋為何要推行青苗法，青苗法為何要收二分利息，論證謹嚴周密，而無虛言浮詞，直是一篇議論文之作。

王安石的記敘文，往往熔敘事和議論於一爐。《遊褒禪山記》、《傷仲永》等，都是其記敘文中的名篇。他的記敘文尤重議論色彩，甚至有幾乎通篇以議論行之者。如《虔州學記》一文，除去首末兩小段記事外，其中心部分則詳論教育，以至相傳蘇軾評曰：“介甫《虔州學記》，乃學校策耳”（《西清詩話》）。他寫的墓誌銘、哀祭文在其文中佔了不小的比重。他寫的墓誌銘，善於抓住傳主的突出事迹，着重闡述傳主的文章道德，並往往加以議論，而對傳主的家庭、仕歷的敘述則很簡略。在歷來墓誌銘中，諱稱別具一格，尤應指出的是，王安石作這類文章從不苟且（見《答錢公輔學士書》），因此絕少諛墓之作。

第二、注重結構安排，論證謹嚴周密，富於邏輯性。王安石散文的謀篇佈局，頗具匠心。以議論文而言，其文往往先提出論點，然後博引史實，層層論證，環環緊扣，順遞直下，最後重申論點。全篇首尾完整，周匝謹嚴。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，最能體現這一特色。全篇以人才問題為中心，論述面極為廣泛，萬餘言的文章安排得井然有序，無絲棼之感。

第三、不拘成法，自出機杼。黃庭堅曾記載道“荆公評文章，常先體制，而後文之工拙。嘗觀蘇子瞻《醉白堂記》，戲曰：‘文詞雖極工，然不是《醉白堂記》，乃是《韓白優劣論》耳’。”（《書王元之竹樓記後》）王安石之文，固然不及蘇軾那樣縱橫恣肆，變化多端，然亦非千篇一律之作；其文在筆法、章法和體制方面，往往亦能不拘成法，而自出機杼。以筆法而言，有以虛就實者，如《常公墓表》。文為悼念友人常秩而作，因常秩無宦績可記，王安石便從其行誼、出處等方面入筆，用排偶的手法，寫得古勁剛

健，表現出常秩的爲人品行。亦有借客形主、襯托照映者，如《處士征君墓表》一文。文爲記敘征君事迹，但開篇先敘杜、徐兩君事迹，然後才提到征君本人，似乎是三人合志，然而由於三人皆爲“淮南善士”，杜、徐兩君又與征君爲友，故寫杜、徐兩君，即襯托出征君行事。以章法而言，其議論文多是開篇立論，但亦有先辨證舊說再提出論點者，有從駁論入筆先出論點者，或從分析各家評論中提出論點者。以文章體制而言，王安石的記敘文、墓誌銘等往往是變體之作，尤重議論色彩。

第四，運用多種修辭手法，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和形象性。“據事以類義，援古以證今”，是我國古代論說文的傳統，王安石是深諳此道的。他博覽經史，並善於引用於文中。其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一文，引用的經典就有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易經》、“三禮”和《孟子》等。其《上時政疏》一文，歷引晉武帝、梁武帝和唐明皇三帝的史實爲例，從而告誡統治者：“夫因循苟且，逸豫而無爲，可以僥幸一時，而不可以曠日持久。”在引用史實時，其文往往採用古今對比的方法。如《周秦本末論》一文，以“周強末弱本以亡，秦強本弱末以亡”這一相反的史實作對比；《進說》一文則從古之取土與今之取土的方法、古之標準與今之觀念的區別等方面展開對比，從而引出歷史教訓。

王安石文章中的對比手法，往往又與比喻結合在一起運用。如《材論》一文，在論述選拔人才、使用人才時，用了兩組比喻。第一組用驥騏與駑駘作比喻，認爲兩者在平日看不出差別，只有當“引重車、取夷路”時，才能看出兩者的區別，意謂要在使用中選拔人才。第二組用可使犀兕這樣的猛獸立穿而死的利箭作比喻，認爲如果“不知其所宜用，而

以敲扑，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也”，強調了善於使用人才的重要性。他的文章在使用對比和比喻時，還往往運用排比的修辭手法，喻體和被喻體都是成雙成組地出現，句式整齊，增強了文章的氣勢。如《荀卿》一文，先用了一組排比句來提出論點：“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，能利狹而後能澤廣，明天下之理也”，然後用了兩組比喻來說明這一論點。

第五、論點集中，不枝不蔓，語言簡潔明淨。王安石集中，有不少議論短制，最能體現這一特點。這些短文，往往就一事一題論難駁辯，以小見大，洞幽析微，又很講究佈局結構，婉而成章。其《蘇說》、《太古》、《知人》、《閑習》、《龍說》、《答李資深書》、《讀孟嘗君傳》等文，篇幅都在二百字左右。歷代傳誦的《讀孟嘗君傳》一文，全文僅四句九十字。寥寥數言，而文勢如懸崖斷壑，無一句閑語，令人咀嚼不盡。清人劉熙載說：“半山文善用揭過法，只下一二語，便可掃却他人數大段，是何簡貴。”（《藝概·文概》）

王安石散文取得的成就，是對我國悠久的散文傳統繼承的結果，對此前人多有評說。他的詩文在當時已獲盛名，其散文在他生前就曾得到當時文壇巨擘歐陽修的高度評價，並被選入歐陽修自編的《文林》一書。他身後被置於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，成為後世學習的楷模。

最後，就本書的編選工作作一些必要的說明。

一、本書選王安石各個時期所作的各體散文五十三篇。入選篇目的編排，以編年為序；無法編年者放在編年部分之後，依王安石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次排列。

二、原文以王安石《臨川先生文集》（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）為底本，並以龍舒本《王文公文集》等參校。遇有重